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五辑)

总主编/李小明

晋国文化探源

谢尧亭

田建文 / 著

晋国文化是晋国时期的地域文化，其考古文化遗存不断有所发现。在今侯马一带考古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迹、遗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国历史的大致轮廓。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历史的文献记载，给我们简单勾勒出晋国时期的文化渊源。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5辑)

晋国文化探源

谢尧亭 田建文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60-6

G·2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目 录

引 子	(1)
一、晋国始封前后	(2)
二、晋国早期的晋侯世系及大事	(4)
三、天马——曲沃遗址的发现	(5)
四、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8)
五、晋国早期都邑的探索	(11)
六、晋国早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12)
七、曲沃与翼	(16)
八、晋国中期的晋公世系及大事	(19)
九、晋国中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23)

目
录

十、新田与新绛 (27)

十一、晋国晚期的晋公世系及大事
..... (29)

十二、晋国晚期文化的发现
..... (32)

十三、晋国晚期的城邑 (34)

十四、晋国晚期的墓地文化
..... (38)

十五、晋国晚期的祭祀与盟誓
..... (44)

十六、晋国晚期的手工业作坊
..... (50)

十七、晋国文化的总体特征
..... (52)

引 子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考古学文化。晋国文化仅指晋国时期的地域文化而言,不包括三晋文化,也不包括晋国建立之前的古文化。

西周初年文王建邦、武王定国,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室,周成王伐灭唐国而封其弟姬虞。姬虞,字子于,后世尊称唐叔虞,国号仍称唐。唐的地理方位据《史记》记载,可以圈定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域,即后世所谓的河东一带。甚至范围可以缩得更小,约在今翼城、浮山、临汾左近,其考古学文化遗存至今尚未被确认。叔虞之子燹父改国号为晋,后世仍尊唐叔虞为晋国的始祖。晋国在西周时国小力弱,列于甸侯之中,其考古文化遗存历年来不断有所发现。到春秋初年,晋国发生旁支夺宗事件,立都故绛。其后文公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文襄霸业,将晋国综合国力推向高峰。春秋早、中期的考古遗存发现的相对较少。春秋晚期,晋国国都迁移至新田,即今侯马一带,霸业赓续,不久便趋于衰微,迄晋国灭亡共在今侯马定都210年。这二百余年正是晋国由盛转衰、由强变弱的时期,在今侯马一带考古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迹遗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大致轮廓。至战国初年的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已徒有虚名。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韩、赵、魏与名存实亡的晋国并列为诸侯,至更晚时,三家迁晋君于端氏、屯留。公元前

376年废晋靖公为庶人，“晋绝不祀”。如果我们将晋国的兴衰发展道路比作爬山，那么西周时期即晋国早期处于上山阶段；春秋早、中期即晋国中期大致处于山顶阶段；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即晋国晚期则为下山阶段。本文即是要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将晋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概况作一简单勾勒，并尽可能使其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晋国始封前后

传说西周早期有周成王剪桐叶封唐叔虞的故事，其实剪桐就是剪灭唐国。唐与桐在三代文字中极易混淆，由于后儒的讹传，遂使这个故事演义得活灵活现。唐在商代晚期是一个方国，曾发展得颇具实力，它是夏人的后裔所建立的国家，位于夏故地，正是文献所谓的“夏墟”。故周成王分封叔虞时“命以《唐诰》”而“启以夏正”，因唐国的周围都是戎（狄），故命其“疆以戎索”。叔虞所封正是故唐之域，国号仍称唐。而今我们可以谓之新唐，虽仅叔虞一代而已，但与故唐名号相同而实则大异。所谓“河汾之东，方百里”，应该就在今山西曲沃、翼城、闻喜、绛县、襄汾、新绛县和侯马市一带。多年来学者们从各个角度采用各种方法探讨故唐国的文化遗存，但终究一无所获，至今在晋南地区晚商时期即殷墟时期的文化大致处于空白状态。这一现象有不少学者试图作出科学的解释，但是截止目前还难以令人信从。首先我们肯定故唐国是确实存在的，

晋国的始祖即被封于其故地，从历年来多种形式的调查和发掘来看，故唐国遗存虽尚未被确认，但近些年考古工作发现了一些零星的殷墟时期文化的线索。如在浮山县北王乡乔北遗址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在洪洞县永凝堡西周墓葬的填土中也发现有殷墟时期的陶鬲口沿。以上发现虽然还难以说是故唐的文化遗存，但是殷墟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故唐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故唐的地理位置即在今浮山和临汾一带，叔虞所封的新唐也应在此地。目前唐叔虞的墓葬尚未被发现或确认，更谈不到新唐的都城所在，文化遗存一时也还难以确认。据文献和传世铜器铭文记载，周成王之弟叔虞在封国前就已颇有作为，他在辅助其父武王克定殷商、征伐百蛮的战争中曾建立赫赫功勋，他受封于唐，传播周文化于唐故地，为其子燮父建立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他实际上是晋国的第一位国君。至于他为什么要改国号，历代说法不一，或说是燮父徙居于晋水旁边，或说与其父晋献周王嘉禾有关。但无论如何，晋字铭文铜器在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和一般贵族墓葬中都有发现，确定无疑的证实了晋侯燮父改国号确有其事。

二、晋国早期的晋侯世系及大事

从晋侯燮父算起，晋国早期的晋侯共有十六位，他们分别是：

晋侯燮父，唐侯叔虞之子。即位及在位年不清。

晋武侯宁族，燮父之子。即位及在位年不清。

晋成侯服人，武侯之子。即位及在位年不清。

晋厉侯福（幅），成侯之子。即位及在位年不清。

晋靖侯宜臼，厉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858年，在位18年。

晋僖侯司徒，靖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840年，在位18年。

晋献侯苏（籍），僖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822年，在位11年。

晋穆侯费王（弗生），献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811年，在位27年。

晋殇叔，穆侯之弟。即位于公元前784年，在位4年。

晋文侯仇，穆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780年，在位35年。

晋昭侯伯，文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745年，

在位7年。

晋孝侯平，昭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739年，
在位16年。

晋鄂侯郤，孝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723年，
在位6年。

晋哀侯光，鄂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717年，
在位8年。

晋小子侯，哀侯之子。即位于公元前709年，
在位4年。

晋侯缙，哀侯之弟。即位于公元前706年，在
位28年。

晋国早期的大事现存记载的主要有晋文侯勤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废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联合犬戎杀幽王，立宜臼为周平王。平王东迁，晋文侯率军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为此周平王作《文侯之命》嘉勉文侯之功。传世的晋国青铜器“晋姜鼎”就是晋文侯夫人所作之器，器上所铸铭文与《尚书·文侯之命》互为印证，交相辉映。

三、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处于侯马盆地的北部边缘，海拔约600米。东西走向的乔山（又名塔儿山）处其北，绵山和翱翔山居其东，南

与紫金山（绛山）遥遥相望。源于乔山的釜河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天马村东、老张村南，而后注入汾河。它是1962年由国家文物局的谢元璐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的一些工作人员首先发现的，1963年秋，北京大学四位学生在张万钟的指导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1979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与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在邹衡教授的带领下为寻找晋国古都，曾在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县境内进行文物普查，并选定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重点复查与试掘工作。通过这次调查与试掘，基本上搞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约为东西3800米、南北2800米，总面积近11平方公里。从1980年秋季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改为考古学系、文博学院）商周组与山西合作在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十多次发掘工作。

在天马——曲村遗址发掘西周、春秋时代的居住址3712.75平方米，所见晋文化遗迹单位共296个，主要有房址、水井、陶窑和灰坑四类，另外还发现有灶和部分灰沟。居住址中的晋文化遗物非常丰富，仅陶容器残片数量就非常多，可以装两卡车。其它质料有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骨、角器、蚌器及小件陶器等，共计1398件。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最常见的陶器是鬲、盆、豆、罐、甗和甑等。其中鬲、甗、甑属于炊煮器，盆和豆属于盛食器，罐属于水酒器，它们构成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实用器具。自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天马——曲村遗址的西半部一直处于相对繁荣的时期，居住址范围较大，文化遗物也比

较丰富，而到了春秋晚期，天马——曲村遗址的西半部则陡然衰竭下来，居住址范围缩小，文化遗物贫乏。在遗址的西部偏北地区发现了多座陶窑、制作骨器场所、石器制作地及少量铸造铜器的陶范等，说明这一地区应该属于当时的手工业制造区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春秋早期偏晚的地层中出土过一块铁器残片，经鉴定为过共晶白口铁，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铸铁。这一发现把中国古代获得液态生铁的年代提前了200余年。

根据考古工作已知在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地主要分布于两个地点，一处在今曲村镇以北东西长约800、南北宽约600米的范围内是中小型墓葬的密集分布区；另一处是晋侯墓地，位于遗址的中心部位，是一处面积约30 000余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分布区。两处墓地相距约1 200米。在中小型墓葬分布区共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其中铜礼器墓葬47座，均属于西周时期，车马坑6座。根据调查分析，该墓地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总数可能超过20 000座。

在中小型墓葬分布区发现青铜礼器147件，种类有鼎、鬲、甗、簋、簠、盆、盃、爵、觚、觶、尊、卣、勺、盘、匜、壶、钟和支架共18种。兵器135件，有戈、矛、剑、斧、殳、弓形器和镞共7种。另外还发现车马器、工具及其它小饰件。在24座墓葬中发现锡器33件，其中有礼器9件，分别为鼎3件，簋5件，盘1件，兵器有戈1件。陶器可分为工具和容器两类，工具有纺轮、陶垫等。在484座墓中共发现陶容器1118件，其中鬲517件、罐222件、豆151件、盆

96件、簋48件、大口尊35件、壶18件、甗12件及三足瓮和杯等。共发现2座有殉人的墓葬，每墓各殉1人，殉狗的墓葬有23座。

中小型铜器墓为三鼎墓，唯M6081出土了4件铜鼎，邹衡教授认为它即是唐叔虞之墓，未必是。但该墓出土的小铜方鼎铸有较长的铭文，属晚商时期的一件重器则是非常重要的。从陶器墓来看，西周早期的墓最多，西周中期的次之，西周晚期的墓又次之，春秋早期的墓较少，春秋中期的墓更少。春秋晚期仅发现两座墓葬。

四、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晋侯墓地位于天马——曲村遗址的中部。

1992年以来发现的晋侯墓地截止到目前为止共发现10组20座大墓，分别为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在晋侯墓地还发现了一些中小型墓葬、大型墓葬的陪葬车马坑及祭祀坑。

1992年春发现晋侯墓地被盗。

1992年4月开始对晋侯墓地进行首次发掘，清理被盗的M1、M2，从此揭开了晋侯墓地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幕。

1992年10月开始晋侯墓地的第二次发掘，清理了M9、M13；M6、M7；M8及8座附属于大墓的祭祀坑。

1993年4月进行晋侯墓地的第三次发掘，清理了M31、M32及附属于M31的三座陪葬墓。

1993年9月对晋侯墓地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清理了M62、M63和M64及附属该组墓葬的20余座祭祀坑。

1994年5月进行晋侯墓地的第五次发掘，清理了M33；M91、M92；M93、M102及附属M93的20余座祭祀坑。

至此晋侯墓地的发掘暂告一段落，共清理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8组17座，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

2000年10月对晋侯墓地进行了第六次发掘，清理了M113、M114两座大墓，进一步确认和钻探出周代墓葬和车马坑多座。

此后又发掘了一座有陪葬车马坑的大墓及数座中小型墓葬，材料尚未刊布。

从目前发现的晋侯墓地来看，若以东西为排可以分为北、中、南三排，以组为单位从早到晚它们的顺序是：M113、M114→M9、M13→M6、M7→M32、M33→M91、M92→M1、M2→M8、M31→M62、M63、M64→M93、M102。其年代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包括了整个西周时期。各墓方向基本相同，以南墓道中线为准，一般为 190° 左右。凡有单墓道者都位于墓室的南部，双墓道者位于墓室的南北方，无墓道的墓也呈南北向，各组墓葬都发现有车马坑陪葬（M91、M92组的车马坑可能压于今路基下面）墓葬形制有单墓道甲字形墓11座，单墓道长条形墓4座，单墓道箕形墓1座，双墓道中字形墓2座，无墓道长方形竖穴墓1座。单墓道长 $10-20$ 米间，宽 $2-5$ 米左右，以斜坡式多见，也有个别为台阶式的，墓室一般为长方形，多口小底大，个

别口底同大，墓口长一般在5—6.5米间，宽4—5.5米，墓深多在7—8.4米间，M8、M31组最浅，M31深4.77米（M9、M13；M6、M7大小不详），M114组最深，M114深11米，M113口长4.2、宽3.2、深12米。在墓道中放置殉车的现象在北排几组多见。自M1发现有7块自然砾石后，以晚诸墓大都有积石现象。M7椁下垫有一层木炭，到M92时已发现大量的积炭，以后则比较普遍，M62则既无积石也无积炭现象存在。大多数墓葬葬具为二棺一椁，M33、M6、M7、M13、M113、M114为一棺一椁，M2为一椁，棺数不明，其中M6、M7、M33、M2皆被盗（M32葬具情况不明），葬式凡可辨者都是仰身直肢，M114组、M64组、M93组头向北，M91组头向南，在墓位上除了M9、M13组和M113、M114组男西女东外，其余几组都是男东女西。在所有的晋侯及夫人墓葬中只在M114的墓室发现一个殉人。在鼎簋数量上M113为八鼎六簋、M91为七鼎五簋、M93为五鼎六簋，M13、M1、M8、M64为五鼎四簋（盥），M6、M33、M114被盗不全，M9资料不详，其余诸墓都为三鼎墓。凡晋侯墓中都有乐器和兵器，晋侯夫人墓中皆无之。另外每一座墓葬中都发现有一件陶鬲（M32、M64、M93未详）。在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仅M92一座墓葬中就发现玉石器达4000余件，在M8、M31、M64、M62、M91、M92和M93等墓葬中都发现有缀玉覆面，其中M8和M92发现缀玉覆面2套，另外在大多数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串饰及各种动物、人物造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M8、M64和M91等三座墓葬中发现的

金带饰及M8、M64二墓中发现的两组7件兔尊。

在晋侯墓地发现的铜器上铸有多位晋侯的名字，他们分别是：M9、M113、M114有“晋侯”、M33、M91、M92有“晋侯燹马”、M91、M92有“晋侯喜父”、M1、M92有“晋侯对”、M8有“晋侯稣/晋侯斨”、M64有“晋侯邦父”。与史书记载相参照研究，一般认为M113、M114墓主是晋侯燹父及其夫人，M9、M13墓主是晋武侯及其夫人，M6、M7墓主是晋成侯及其夫人，M32、M33墓主是晋厉侯及其夫人，M91、M92墓主是晋靖侯及其夫人，M1、M2墓主是晋僖侯及其夫人，M8、M31墓主是晋献侯及其夫人，M62、M63、M64墓主是晋穆侯及其夫人，M93、M102墓主应是晋殇叔或晋文侯及其夫人。由于晋侯墓地发掘工作尚未全面结束，有关问题还存有异议，定论还需时日。

五、晋国早期都邑的探索

晋国始祖叔虞被封于唐，其子燹父改国号为晋，到晋武公“旁支夺宗”时止，晋国都城位于何处？是否曾迁都？迁过几次都？这些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晋侯墓地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和希望。

目前在晋侯墓地还没有发现唐叔虞的墓，也没有发现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晋小子侯和晋侯缙的墓。在唐叔虞的墓、唐城和唐的文化遗物没有确认的情况

下讨论始封地唐的具体位置似乎没有实际意义，任何讨论也仅仅限于推测。而晋侯墓地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晋国早期的都城就在其附近，而且在天马——曲村遗址还发现了自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的贵族铜礼器墓葬40多座，以及遗址内丰富的文化遗存都支持这种观点，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切的都城位置和范围，但是可以肯定它不会距离晋侯墓地很远，围沟——北寿城古城或者可以考虑是晋国当时的都城。这个都城我们认为它就是历史文献记载中的都城“翼”之前的晋都，不仅因为曲村有晋文侯墓而未发现以晚诸国君之墓，而且翼作为晋国都城名称在文献记载中又出现得较晚，正是始自晋昭侯。因此文侯以后可能即迁都于翼，其地域在今翼城县故城、南梁村一带，事实上在晋文侯以后晋国实际上是存在翼和曲沃两个政治中心，翼都的地位远不如文侯以前的晋都了。

六、晋国早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晋国早期文化的研究是伴随着天马——曲村遗址发现和发掘的不断丰富而逐步展开的。实际上在山西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工作做的并不少很多，除了天马——曲村遗址之外，可以作为研究晋文化材料的只有侯马的上马墓地、洪洞县的坊堆、永凝堡基地和闻喜县的上郭——邱家庄墓地等资料。但是像洪洞坊堆、永凝堡这样的资料未必都属于晋国文化的范畴，因为在西周时期晋国地域狭小，周围小

国林立，戎狄杂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诸侯国，在与土著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不尽相同的文化。

上马墓地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遗址位于上马村北浍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台地高出周围3—6米，顶部平坦，平面略呈长方形。但是此处遗址仅有极少量的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的遗存，陶器以鬲、豆、罐为主，另外还有部分春秋中晚期的遗存。该处遗址目前已被破坏，荡然无存。上马墓地的墓葬时代最早者也仅可早到西周晚期或略早，在这一阶段共发现38座墓葬，没有发现铜礼器墓葬，而仅发现有随葬一件陶鬲的小墓，陶鬲种类较少，特点是弧腹、无肩。墓葬多为口底同大的长方形竖穴墓。

闻喜县上郭——邱家庄墓地位于今闻喜城东南约4公里的涑水河东岸高丘上，在南北长约10、东西宽约5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西周至汉代时期的大批墓葬和一段古城墙遗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里属“古曲沃”的范围。古曲沃是晋国的旁系晋文侯的弟弟、晋昭侯的叔父成师（号为曲沃桓叔）的封地，后来这个旁系逐渐发展壮大并发生了“旁支夺宗”事件，尽管后来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故绛”，但是古曲沃一直是晋国这一旁系的宗庙所在地，是晋国与故绛并行的另一处都邑。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即后来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七、八十年代先后在这里做了5次考古工作，发现并发掘了一批西周至汉代时期的墓葬。1974年7—12月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在上郭墓地钻探出古墓葬380余座，清理了24座。1975—